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21.01.007

· 社会学研究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笔谈

特约主持人: 刘少杰教授

主持人语: 近年来,随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的呼声日益增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引起了更多的学者关注。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地位?如何判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以及其他社会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各种当代社会学新思潮?对待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回答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甚至在某些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名义发表的文献中,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楚。然而,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是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和方法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形形色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论战和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指导中创立的。与那些在学者的书斋里阐发出来和在大学的讲坛上讲述出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理论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首先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性和丰富实践性的学术传统而存在的。也正是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形成方式,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仅是一个不断发展、持续演进的思想体系,而且还以其广阔的理论胸怀不断吸纳各种反映社会发展变迁的学术新潮,衍生了五彩缤纷的学术流派,表现出旺盛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历了从19世纪中叶到当代的历史发展,形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东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些有不同的思想理论或学术流派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展开与发展,其中包含的思想内容和学术观点十分丰富。应当在明确认识和清楚概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原则和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新学说、新流派作出充分考察和深入总结,以便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更高层次的学术境界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创新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本次笔谈邀请的几位学者分别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学科建设,阐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起源、法国列斐伏尔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研究,初步展现了我们对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思想理论追求。

特约主持人: 刘少杰,男,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安徽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空间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21)01-0063-31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与学科建设

刘少杰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实证主义社会学是在相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思想观点都发端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由此而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学术传统。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在其经典时期就开始了学科化,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后继者们虽然也曾试图推进其学术传统的学科化,但未能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这种区别,使其在当代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产生了超越学科边界的广泛影响,也展示了与实证主义社会学不同的旺盛活力。

一、在对立中生成的两种学术传统

很多学者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观察、分析与理论概括,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开端。事实也正是如此,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开始了对底层社会生活的调查研究,并通过对底层社会问题的考察与分析,逐渐接触到同政治领域和思想意识领域相对立的经济生活领域——市民社会。正是把市民社会或经济生活看成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了与实证主义社会学不同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原则,亦即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更加深入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形成逻辑。马尔库塞曾深入地论述了黑格尔哲学解体后欧洲哲学向社会学研究的转向。在他看来,以思辨形式阐述的黑格尔哲学包含着指向现实的理性要求,其辩证法精神引导了哲学理论向现实生活的转向。因此,当黑格尔哲学解体后,直面现实的社会学就顺理成章地代之而起。“从哲学向国家和社会领域的过渡已经成为黑格尔体系的一个内在本质部分。他的基本哲学观点在国家和社会假定的特殊历史形式中已经实现了自身,而后者则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的兴奋中心。哲学已经转化为社会理论。”^①

马尔库塞深入分析了黑格尔哲学解体后形成的社会学两大传统:高扬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坚持客观原则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两种社会学抱着对黑格尔哲学不同的态度展开了自己的理论视野和理论追求。“马克思把他的理论集中在劳动过程上,并且通过这样做完成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即内容(现实)的结构决定了理论的结构。他使市民社会的基础成为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这样的社会根据普遍的劳动原则而运动,因为劳动过程决定了人类存在的整体;劳动决定了所有事物的价值。由于劳动产品不断地广泛交换而使社会得以永恒存在,因而,人类关系的整体就被直接的经济规律所统治。”^②

概而言之,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坚持劳动实践和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进而承认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对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决定作用,在运动变化中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这就是马克思社会学最基本的原则和立场。但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又有明确的区别,黑格尔哲学并没有否定现存秩序,而马克思社会理论则直接要求现存秩序发生改变。“在黑格尔体系中,所有的范畴都终止于存在着的秩序中,与此同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所有的范畴则是触及

^{①②}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程志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29、248页。

这些存在着的秩序的否定。”^①

孔德创立实证主义社会学时也对德国哲学展开了批判,但这是另一种批判,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马尔库塞明确指出“实证哲学被认为是要在整体上战胜否定哲学,也就是说,要废除任何把现实从属于超验理性的做法。并且,它将引导人们去观察和研究被普遍有效的规律所控制的作为中立客体世界的现象。”“实证哲学目的是要反对批判过程,它包含了对特定的东西的哲学否定,以及恢复事实实证的尊严。”^②概括说,实证主义社会学反对辩证法原则,主张用抛弃价值评价的客观原则去考察由客观规律规定的世界,用科学的实证方法而不是辩证的批判方法去认识客观世界。

总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社会学都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否定,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保留了批判的辩证法原则,在劳动实践和经济关系基础上批判旧世界、建立新秩序。实证主义社会学则否定了辩证法和劳动实践原则,主张无批判地客观观察和描述外在世界,顺从现存统治,维护既存社会秩序。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实证主义社会学是尖锐对立的,前者是积极的、批判的、要求现实秩序发生变革的社会学,而后者是保守的、肯定的,维护既存秩序、顺从现存统治的社会学。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实证主义社会学在初创时期的对立,是两种学术传统的对立,马克思和孔德都分别为自己创立的社会学确立了基本立场、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尽管在后来的演化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实证主义社会学不仅有对立、有交叉,并且演化出很多新的流派。但只要追问其是否坚持实践的立场还是坚持客观的实证立场,是否坚持辩证分析还是客观观察的方法论原则,是否坚持从生产实践出发考察社会结构的矛盾运动和历史变迁,是否捍卫基层群众的根本利益还是维护社会控制秩序,就可以清楚地判别其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还是属于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

二、未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建设

实证主义社会学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形成之后,进入了学科化的发展阶段。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学科化或学科建设,首先是迪尔凯姆奠基和推进的,是他在19世纪后期执着地追求学科化的目标并将之付诸了实践。一般说来,通常以迪尔凯姆的这几件事为标志说明实证主义社会学作为一个新学科实现了建立任务:1887-1902年,他在波尔多大学任教,创办了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1891年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1895年出版《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准则》;1898年创建《法国社会学年鉴》,形成了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1902年他受聘为巴黎大学社会学教授。这些在10年左右时间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经过迪尔凯姆的努力,实证主义社会学已经立足于学科之林,受到了国民教育体系和学术研究体制的认可。

迪尔凯姆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在学科建设上的努力和贡献,具有深远的意义。实证主义社会学跻身于国民高等教育体系之后,在大学里广泛建立了社会学院系,坚持用实证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原则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专业人才;不仅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通过大学讲坛稳定持续地传承下去,而且在社会学专业队伍不断扩大、视野不断扩展和研究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中,又衍生出很多分支社会学,如家庭社会学、社区社会学、阶层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制度社会学……,名目繁多,难以列数。但无论分支社会学如何多样,大部分都坚持迪尔凯姆奠定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方法原则,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由此而成为社会学的主流。

在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呈现了繁荣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卢卡奇、

^{①②}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程志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35、295页。

葛兰西等人开创并由法兰克福学派大力扩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成了其主要的思想内容和理论表现,可以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对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表现出实践立场和辩证分析的旺盛活力和强烈的思想感染力。然而,同在欧美各国已经作为学科而实现了体系化发展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相比,其队伍阵容和发展势头还是差距明显。

在同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对比中,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意识到实现马克思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列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列宁指出“在这以前,社会学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总是难于分清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主观主义的根源),找不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分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列宁的结论是: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的原则,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①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观点,指导和推动了一批苏联学者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中央急于稳定社会秩序、推进社会发展,高度重视社会学研究和社会调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变得十分活跃。M. 谢列布里亚科夫、H. И. 布哈林和C. 奥兰斯基是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他们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内容。1921年,布哈林发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体系做了通俗易懂的论述。奥兰斯基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地位与特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关系,以及怎样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开展社会问题研究。

可见,十月革命后苏联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但令人遗憾的是,自1938年斯大林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历史唯物主义被当作是唯一能解释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学说,社会学被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遭到了排斥。也正是在1938年,布哈林被作为叛徒遭处决,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观点也遭到了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此销声匿迹。并且,这种变化迅速波及中国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再有人提及。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的名义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做了实质性的奠基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生活中的根本地位,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是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决定因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等一系列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未能在这个理论上顺利地实现学科化建设。

三、面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发生了空前深刻与复杂的变化,紧密关注现实发展变化的社会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不

^① 《列宁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第110-112页。

仅实证主义社会学在其奠基的学科体系中继续发展,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以及城市社会学和乡村社会学等延续实证主义传统的分支学科也都纷纷崭露头脚,而且原来立于社会学学科体系之外的现象社会学、解释社会学,也纷纷以不同的形式、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中,推进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如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常人方法学、福柯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吉登斯为代表的结构互动论和风险社会学、鲍德里亚为代表的符号价值论和消费社会学,五光十色、各有洞天的新社会学流派,都携带着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立场与原则进入了当代社会学体系中的学术新潮。

在实证主义社会学同其他社会学传统发生互动相融的崭新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也同实证主义社会学发生了广泛的交流与会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积极向社会学学科挺进,在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原则和主要思想观点基础上,同实证主义社会学一起直面后工业社会到来后人类社会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在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宽容的理论胸怀中,形成了很多令世人瞩目、具有广泛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流派。如列斐伏尔、哈维和苏贾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卡斯特为代表的网络社会学,布迪厄为代表的实践社会学或场域社会学,这些生机勃勃、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新社会学流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在当代的传承和延续,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当代发展。

另一方面,某些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也开始吸收或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立场和观点,形成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在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学术创新。林南等人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研究,在坚持实证主义社会学客观论立场的同时,不仅吸收和借鉴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本质、资本投资与资本市场等理论观点,而且在社会资本的投资行动与社会关系客观结构的互动中研究社会资本,建立了可以引导社会成员开展积极投资行动的社会资本理论。林南在其代表作《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中论述的这些观点,实质上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立场是一致的。

还有一些坚守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立场,甚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者,在其著述中也不得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某些基本观点,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实证主义社会学在当代学术研究中交叉与会合的不可避免性。近年在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的迈克尔·曼,反对马克思主义从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出发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主张从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的四种来源考察社会历史变迁。^①但是,当迈克尔·曼阐释他的“权力网络的构成”时,又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观点:

源于四种来源的权力有不同的特点。经济权力是最嵌入日常生活的,也施加着循序渐进而旷日持久的因果压力。意识形态出场突然,气势逼人,但不规律,只是偶尔具有极其强大的超越的形象,军事权力的使用具有突然、偶尔和激烈的特点,但在技术方面也是不断积累的。政治权力是以领土和制度化为特征。^②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向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扩展与会合的学术新潮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西方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之中,不仅空间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分支学科已经吸收了这些前沿的新理论、新学说,而且网络社会学和社会资本理论的一些重要成果也已经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社会学新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影响。

上述讨论的理论现象主要发生在西方社会学之中,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学科建设方面还十分薄弱。尽管近几年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呼声日渐增强,但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原则和基本观点融汇到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之中,

^{①②} [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文版前言》,第1、19页。

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

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基本上是学习欧美社会学学科体系建立起来的。无论是社会学学科设置和分支学科的建立、社会学专业的课程设置,还是人才培养的规格和层次,基本上都是对欧美社会学的移植和模仿。不过,经过4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学同恢复重建之初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模仿欧美社会学,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群学的学术精华和方法原则也吸收到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之中。

应当承认,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就其形式上看已经基本齐全,诸如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中外社会学史、社会学研究方法、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城乡社会学等分支学科都已基本健全。在高等院校的社会学专业教学中,为各门课程配备的师资队伍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凝练,也使社会学各分支学科的内容得到了深化和充实。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而言,在学科建设上的重要任务不是在现有社会学学科体系之外再建立一套新的学科体系,而是把马克思社会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原则和基本原理融入现有社会学学科体系之中,并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指导地位。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其主要任务不是学科形式的构建,而是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提升和作用发挥。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必须同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健康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史研究”(19FSHA001)。

作者简介:刘少杰,男,安徽大学讲席教授,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基地主任。

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起源及其理论基础的奠定

翟岩

民粹主义是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及运动的土壤和理论基础。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民粹主义理论已落后于时代,进而发生了分化,其中一支分化为革命的民粹主义,另一支分化为民粹主义改革派。从革命的民粹主义中发生了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从民粹主义改革派中又分化出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主观社会学。民粹主义主观社会学对当时的俄国社会和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对民粹主义主观社会学的全面批判,使马克思主义走到了俄国社会学历史发展的前台,奠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确立了唯物史观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的基础理论地位。

一、俄国民粹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俄国民粹主义由赫尔岑奠基,经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得到了发展,超越了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其核心是俄国通过传统农村公社的独特道路,绕过资本主义,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俄国民粹主义与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斯拉夫主义有密切关系,但列宁在讲到民粹主义

起源和形成时说“民粹主义由来已久。人们公认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①车尔尼雪夫斯基“继赫尔岑之后发展了民粹主义的观点，”^②比赫尔岑前进了一大步。

赫尔岑“俄国社会主义”的思想一部分来源于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另一部分来源于他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立场，再一部分来源于他对俄国村社性质和历史的充分认识和了解。按照赫尔岑的说法，“它来源于土地和农民的生活，来源于每个农民实际有一份土地，来源于土地的再分配，来源于村社占有制和村社管理——并且将同劳动者的组合一起去迎接社会主义所普遍追求的和科学所承认的那种经济上的正义”^③。村社不仅是简单的生产组织，还是社会组织，更是农民的精神共同体；村社的日常运行是靠自我管理和成员的相互监督，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世代相传的原则和道德规范，如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

在赫尔岑那里，拥有公有制土地是农民的一种自然、天赋的权利，他们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在土地上。村社的一切包括土地分配、税收以及人员选举及配置等，都由他们的最高自治权力和决策机构——村民大会决定。村社中的人是平等、互利、权利共享的关系，生产是集体劳动组合与协作，管理是连环保甲与风险共担机制。这样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生产性质、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使俄国农民成为村社天然的维护者。村社自然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土壤，“是俄罗斯社会的根基，只有认识这些根基，才能理解它们的发展，或者它们的精髓……村社是整个俄国史上一个保存完好的公民机构。如果取消了它那就没有一物所剩，因为从它可以发育出整个公民世界”^④。因此，村社是实现“俄国社会主义”的保障。

赫尔岑认为，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在经济上必然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使社会失去公平和正义。但“俄国社会主义”的村社，不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生产关系，每个农民都有独立的人格和权益，他们的劳动不是被迫的，而是共同意愿下集体的、自愿的。更为重要的是，村社的制度安排可以让农民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和谐相处、提高生产效率，解决资源、土地、财富、收入等原本十分复杂的系列问题，还可以使生活稳定有序，进而铸就村社的各种外化制度，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群众——这是一股自发的力量，是汪洋大海；他们的道路是大自然的道路，他们是大自然最亲近的继承者，他们受到模糊的本能和无意识的激情支配，拼命保护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⑤因此，俄国社会主义可以通过人民的力量，以人民的诉求为核心来实现。“庄稼汉是属于俄罗斯未来的人，正像法国的工人一样。而我们这些经历过西方文明的俄国人，即知识阶层，只不过像工具，像发酵剂一样，是俄国人民和革命欧洲之间的中介。”^⑥“未来的时代在其旗帜上标志的不是个性，而是公社；不是自由，而是博爱；不是抽象的平等，而是劳动的有机分配。”^⑦这样，俄国就不必再重复西方的道路，避免再次踏入罪恶的、鲜血铺就的资本主义河流。

赫尔岑之后的别林斯基，“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全人类的思想，一种革命启蒙的思想，一种解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6页。

② 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2页。

③ [苏]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85页。

④ [俄]霍米亚科夫《霍米亚科夫文集》，第3卷，莫斯科：1990年俄文版，第462页。转引自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0页。

⑤ [俄]亚历山大·赫尔岑《来自彼岸》，刘敦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10页。

⑥ [俄]赫尔岑《论社会主义》，莫斯科：1974年俄文版，第292页。转引自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5页。

⑦ [俄]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2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36页。转引自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9页。

放一切不幸者和受压迫者的思想”^①。在他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每个人都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因此必须摧毁现存的社会秩序。但社会主义在别林斯基那里还停留于空想性和启蒙性,缺乏科学理性,且带有强烈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意识。因此,他只把村社当成一种历史遗迹来理解,并没有当成重要的革命因素,他不相信村社对实现社会主义的真实作用,也没有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更难把阶级和阶层以及工人和农民区分开,自然还没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继承了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传统,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俄国专制农奴制度,但已有别于其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他认为,俄国集体所有的土地性质,不但可以抑制私人经济贪婪及无节制的疯狂发展,使资本主义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还可以把人们从被剥削和被压迫中解救出来。为此,他提出保存公社,捍卫公社土地所有制,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因为,就俄国公社所有制来讲,虽然其土地关系是原始形态,但公社所有制却是土地关系发展到高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时应有的形态。俄国完全可以在欧美先进生产力的影响下,使这种公社所有制迅速升级,达到欧美社会发展所必然指向的那个以“公社所有制”为主要特点的高级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

为此,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公社的土地使用是拯救绝大部分农业人口,使其免于与长工和贫困有不解之缘灾难的唯一办法。”^②因为公社制度能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使大部分国民的财产大体相当,人际关系也不会出现纷争或不和谐。保留农村公社,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发生、发展、壮大的社会土壤和条件,俄国就会避免西方资本主义遇到的毁灭性危机。社会人口结构和阶级结构,也不会像西欧那样出现两大阶级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符合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向。后人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所占据的地位,在马克思的所有先驱者中……他较之所有人更接近科学社会主义”^③。其世界观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也有民粹主义的成分,但马克思主义成分占主要地位。“同民粹主义相比,更接近马克思主义。”^④因此,也被列宁称之为是继赫尔岑之后发展了民粹主义观点、在理论上做出了创始性和奠基性贡献的人。

二、俄国民粹主义在分化中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向

俄国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思想几乎是同时代的产物,他们都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最早由俄国民粹派人物向俄国国内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就俄国革命及俄国村社问题,也与俄国民粹派进行过详细沟通和交流,并给予过多次理论指导。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民粹主义理论已落后于时代,进而产生了分化及马克思主义的转向。

马克思曾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称赞不已,对俄国公社问题也做过专门研究。他曾详细分析作为原生社会形态的俄国农业公社所包含的公私二重性及其自身的运动规律。“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巩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和较古老的公社的条件

^① 《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莫斯科:1953年俄文版,第114页。转引自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5页。

^② 徐毓坤编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思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3页。

^③ [苏]B. H. 吉涅夫《19—20世纪的俄罗斯·论文汇编》,圣彼得堡:1998年俄文版,第298页。转引自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2页。

^④ [苏]H·A·罗日科夫《俄国史比较研究》,第1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俄文版,第137-138页。转引自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是不相容的。……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① 马克思认为 “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② 拯救和改造俄国农村公社的策略应当是，在避免其私有原则在农业公社中占主导地位的同时，通过吸收和占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来大力促进俄国农村公社中集体原则的发展与升级，从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就俄国革命和农村公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给予俄国民粹主义者三次指导。第一次指导的内容是 “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③ 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在于强调农村公社对于俄罗斯命运的历史重要性，如果农村公社制度遭到毁坏，俄国就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无法实现。第二次指导的内容是 “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够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④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肯定了俄国农村公社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然后指出了发挥支点作用的前提，即必须阻断沙俄政府反动政策和资本主义带给公社的破坏性——而这就意味着俄国革命的迅速成功；此外，还要保证公社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这表明，革命成功后，新政权还要对公社采取能使其自由发展的政策措施。^⑤ 这是对俄国革命前途和农村公社命运作出的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断。第三次指导的内容是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⑥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民粹主义的三次指导中可以看出，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要想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俄国革命要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二是上述两方面的革命要能互相补充。^⑦ 马克思恩格斯还希望俄国革命少走弯路，利用公社的俄国传统和制度，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迈向社会主义，并最终奔向共产主义。

19 世纪 80—90 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使社会阶级结构发生迅速变化，一方面产业工人的数量急剧增加，成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使农民离开了土地流向城市和工厂，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日益壮大，民粹主义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而走到了历史前台，农村公社制度失去了革命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因而开始分化和转向。一支分化为激进的、带有恐怖性质的“民意党”，另一支则分化为温和的自由改革派。此时，“民粹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初次公之于众”^⑧，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也开始分道扬镳。一些革命者和进步青年，在寻求新的思想和理论中自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完成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向的代表是普列汉诺夫。1881 年底，普列汉诺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俄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及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形成进行分析研究，总结了西欧工人革命运动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以及德国和法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包括自己对俄国革命经验的感悟和体会，评估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价值和地位，吸取了民粹主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而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完成马克思主义转向的标志是其翻译俄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开辟了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史上的新时代，这是一个无情地批判现实劳资关系以及与任何乌托邦不同的、科学论证社会主义的时代。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必然导致夺取国家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由此普列汉诺夫彻底摆脱了民粹主义理论纲领和策略中的空想主义成

①②③④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 434、450-451、129、269、326 页。

⑤⑦ 马龙闪、刘建国 《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21-222、223 页。

⑧ 《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2 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63 页。

分的非科学性,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及一切空想社会主义本质的区别。

普列汉诺夫以《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从理论上拉开了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向的大幕。他明确指出:第一,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来自民粹派宣传的空想的落后理论,它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客观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因此,民粹派的理论体系和纲领必然遭到完全的失败;第二,在资本主义影响下瓦解的农村公社,不可能成为抗衡资本主义的支柱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村社不是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而是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第三,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经济规律的合乎规律的客观过程,也就是说,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无产阶级,而只有它才能承担起解放运动的使命,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它本身自觉行动的结果;第五,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资本主义的矛盾,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消除其成长发展的一切不利条件。^①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贡献,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俄国具体实践结合了起来。

三、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基础的奠定

俄国民粹主义在分化和演变中,形成了一支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具有完整思想理论体系和世界观的主观社会学,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对俄国社会和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普列汉诺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用科学的唯物史观对主观社会学的唯心史观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奠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则确立了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础的理论地位。

米海洛夫斯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他认为社会学研究中掺杂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主观方法就成了米海洛夫斯基有关社会总体观念的决定性因素”^②。他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把英雄和群众、“英雄”和“群氓”对立起来,强调精神和意识的作用,强调个人和英雄创造了历史。这给当时整个俄国社会和知识界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此时普列汉诺夫挺身而出,借用马克思的话指出,“将‘批判的思维的’人物和‘群众’对立只不过是黑格尔的历史观点的讽刺画面——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念本身也不过是关于精神与物质对立学说的思辨的结果。”^③在《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中,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对主观社会学的思想来源、脉络、派别、理论基础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旗帜鲜明地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下来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意见支配的世界”,以及个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明确了历史不是个人和英雄创造的,而是由人民创造的。米海洛夫斯基社会学的主观法,是荒谬绝伦的唯心主义,人的理性不可能是历史的造物主,因为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

针对主观社会学中的社会经济依赖问题,普列汉诺夫指出,以前无论是法国的历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黑格尔都没有给出满意的回答。而马克思用科学的唯物史观,从人的因素及人的历史作用,从历史运动的原因和结果上,纠正了在“精神属性中,在绝对理念之逻辑的发展规律中寻找”^④原因的唯心主义的根本错误。针对社会生产积累、社会关系等问题,普列汉诺夫又指出“生产力发展的任何特定的阶段,必然地引起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一定的结合,即一定的生产关系,亦即整个社会的一定的结构。而既然有了社会的结构,就不难了解,它的性质将一般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47-348页。转引自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

^② 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

^{③④⑤} [俄]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选》,张光明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4、114、153页。

性反映于人们的全部心理之上,反映与他们的一切习惯、风俗、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之上。……社会的心理永远顺从它的经济的目的,永远适合于它,永远为它所决定。”^⑤普列汉诺夫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明了人的理性发展历史,全部都归结为社会行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本质是实践,一举奠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

列宁把唯物史观确立为社会学的基础理论或元理论,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理论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针对民粹主义主观社会学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科学的伟大意义,列宁指出“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①《资本论》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说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正是这个基本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和客观规律,使人们能够正确认识社会现象,进而把社会学放在科学基础之上,社会学由此而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②列宁进一步指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③列宁不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把社会学置于科学基础之上,而且还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体系,本身就是科学的社会学。由此列宁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原则,其逻辑起点及实践性和阶级性等学科特征。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逻辑起点在列宁那里,是现实中生活的人,实践是其最显著的思维方式和学科特征。由此批判“主观社会学把社会历史变迁动因归结为人们的主观意志,认为个体根据自己的目的开展的选择行为可以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主观社会学颠倒了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与被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归结为个人主观任意的偶然事件的堆积过程,其结果只能形成对社会历史过程的错误解释”^④。列宁指出“在此之前,社会学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总是难以分清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根源),找不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的客观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⑤“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的过程。”^⑥这“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这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直接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了下来;这样一来,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⑦

列宁彻底批判、颠覆了主观社会学“关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主观性,个体社会中的决定性以及社会分析的超历史性和超阶级性”^⑧的理论,进而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特征的阶级性、价值性和理想性,即马克思主义所依靠的是无产阶级,主张的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循着社会发展的客观自然规律,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应从阶级的立场评价社会事物,看待社会问题,是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起源及理论基础的奠定,始于民粹主义创始人赫尔岑的“俄国社会主义”学说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一学说的理论贡献,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民粹主义的理论指导;中间经历了民粹主义的不同分化,以及部分民粹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奠定于民粹主义主观社会学对俄国知识界和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及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主义主观社会

①③⑤⑥⑦ 《列宁全集》第1卷,第2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7、112、109、110、109页。

②④ 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与理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78页。

⑧ 郑杭生、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

学的全面批判;进而明确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逻辑起点及学科特征及其理论基础和理论地位。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大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19XNLG04)。

作者简介:翟岩: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网络社会学。

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辩护: 列斐伏尔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

营立成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颇可玩味:一方面,人们公认马克思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古尔维奇甚至称马克思是“社会学之王”^①),认可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社会学视角;另一方面,“主流”社会学从未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学的真正成员^②,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联系在一起,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独特社会学遭到了诸多质疑。相对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质疑和挑战,列斐伏尔是为数不多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西方著名学者之一。对列斐伏尔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遭遇的思想和方法上的贫困化是一个亟须处理的问题^③,而社会学(更具体地说是一种日常生活批判的社会学)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重要途径。列斐伏尔致力于在马克思思想的母体上探寻具体社会学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与《马克思的社会学》等著述中,他比较清晰地勾勒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图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分析现代社会的有效性、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做了有力辩护,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要研究的核心领域及其发展方向做了深入探讨,这些讨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思想蕴含着理解现代社会的社会学

列斐伏尔在《马克思的社会学》一书序言部分开宗明义“本书提出这个问题……马克思的著作是否还保有当代价值和意义……或者说,它还是理解现代社会和现实的一把——也许是唯一的一把——钥匙吗?”^④这一问题并非无的放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普遍的质疑就是它在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有效性。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属于过去,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在19世纪的现实基础上,而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种种预言都没有实现。^⑤例如,马克思主义预言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阶级斗争将会更加激烈,事实上,尽管社会矛盾冲突仍然此起彼伏,但这些冲

① 潘允康《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179-188页。

② 赵万里、阎焱《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叙事——基于欧美教科书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南开学报》2020年第5期,第75-85页。

③ [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8页。

④⑤ [法]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谢永康、毛林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序言第1页,正文第146页。

突主要是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学生运动等，阶级冲突并未占据主导地位。^①作为一种“落伍”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难以对现代资本主义做充分的社会学分析，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社会学自然也难有解释力。^②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很强的内在自洽性，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会越来越明显，伯恩鲍姆（Birnbaum, 1968）将这一问题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危机”（The Crisis in Marxist Sociology）。^③

对于上述批评，列斐伏尔做了非常明确地回应“对于理解当今世界来说，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是充分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它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与一种特殊的科学——社会学有着特殊的关联。”^④他首先对那种认为马克思是“拙劣的社会预言家”的观点做了有力回应。在列斐伏尔看来，批评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际上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挑选出一些段落，将这些段落中的论断组合起来放到统称为“社会学”的专门知识领域之中而形成的东西。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虽然一度在德国和奥地利广泛传播，但其实质却是用一种孔德式的实证主义武断地肢解了马克思的思想，将具有辩证性和批判性的分析降格为“描述”和“事实”。^⑤评论者对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的若干观点评头论足，不论最终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对马克思的思想都是不公平的。即使退一步讲，马克思关于社会的若干预言也绝非没有价值^⑥：一方面，马克思的很多预言本身就是被证明是正确的，例如他预言了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的双重压力下终结，这一点无疑是对的，“幸存”下来的资本主义早已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大相径庭，不能因为两者都是“资本主义”而否定马克思的预见性。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确实具有很多新特性，马克思不可能做到“未卜先知”，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方法对新的社会样态开展研究是我们的工作。在从事这项工作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种种分析应该作为一个必要的基础，或者说一个“参照系”。

其次，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研究当代社会中的一个最大优势是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特点。列斐伏尔指出，尽管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找到很多学科的元素，但我们不能将马克思本人看作是一个哲学家、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历史学家，当然也不应该将其看作是一个社会学家，马克思的思想拒绝被某一种特定的总括性方式加以概括，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人最终都失败了，都将陷入某种教条主义之中。^⑦实际上，马克思的思想是全方位的：它获得了一个总体，甚至是建构了一个总体。^⑧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总体性”呢？这样一个总体并不是某一个固化的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多重或复面的概念，关于时间和空间、起源和当下、可能与未来。于今天而言，这种“总体性”可能意味着当今社会所处的危险状态，是对全球危机的某种反思性假说。马克思的社会学就是以这样的总体性为前提，是蕴含于总体性的社会学，这就与那些“就着社会论社会”的一般社会学有很大差别，也体现出某些独特优势，这些优势对理解现代社会是极为重要的。

一方面，“总体性”蕴含着理论与方法创新的潜力。马克思主张知识与现实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在相互补充、相互区别、相互矛盾的不同方面和层次上的总体性。这一套理论不是任何一种学科，也不会受制于学科框架的桎梏，因而能够在方法、视角乃至整体上实现某种创新。^⑨从二战以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发展的总体脉络来看，诸多社

① Aronson, R. (1985).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swer to Marxism's Crisis. *New Left Review*, pp. 74-94.

② 类似观点尤其体现在布洛维和赖特那里，他们提倡放弃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若干核心要素重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参见：Burawoy, M., & Wright, E. O. (2001). Sociological Marxism. In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Springer, Boston, MA, pp. 459-486.

③ Birnbaum, N. (1968). The crisis in Marxist sociology. *Social research*, pp. 348-380.

④⑤⑥⑦⑧⑨ [法] 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谢永康、毛林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7、14、147-148、3、1、15页。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也确实在马克思理论那里找到了灵感和依据,甚至大量后现代理论也需要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去挖掘自身发展的动力,无怪乎列斐伏尔认为正是这样一种“总体性”所蕴含的潜力成为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原创性、创新性和持续性所在。^①另一方面,“总体性”逻辑是克服社会知识碎片化的工具。人文学科的不断分化和专业化是一种发展趋势,但我们今天面向的现代化社会却是复杂性不断增长的社会。如果我们用日益分化的学科去把握日益复杂的社会,最终只可能得到碎片化的知识。以空间的知识为例,列斐伏尔谈道“至于说到各种学科对空间的研究,它们最大限度地分割了它,空间按照被简化的方法论前提而遭到随意地肢解:地理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等等空间。”^②因此,只有形成某种打破学科壁垒、展现知识总体性的机制,才能够对现实社会做出很好地把握,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恰恰具备这个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特点可以让我们在知识统一性和现实总体性的辩证关系中去把握社会现象,这既有助于我们分析具体的社会学问题——如知识的社会学、国家的社会学等等,也有助于我们继承马克思对现代社会进行总体性探究的遗志,进一步探索现代社会的发生和它的复杂矛盾过程。^③

最后,列斐伏尔认为“实践”的概念为现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列斐伏尔谈道“人的本质就是社会的,社会的本质就是实践——行为、行动和互动的过程。”^④“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它在如下几个方面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分析现代社会时具有了独创性和重要性^⑤:第一,实践概念预设了感性世界及其“实践感”的恢复。感性世界是人们能够直观体验的世界,“实践感”则是对通过感觉揭示感性世界的持续性过程,研究现代社会必须让“我们的感觉变成理论家”,深入揭示感性的丰富层次。第二,实践概念彰显对“需要”及其辩证过程的深刻关注。人的需求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分析的起点,揭示由“需要”引发的各种辩证性进程,包括工作、享受、异化等,尤其要在“需要-工作-享受”的辩证关系链条中理解和分析工作。第三,实践概念要求在行动中把握人与自然、意识和物质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必要辩证把握与自然相关的活动(列斐伏尔称为“创制”)和与人类相关的活动(即一般意义上的“实践”),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人际关系、商品、货币、法律等社会学对象。第四,“实践”概念拒绝一种僵化的结构性分析。从基础、结构、上层建筑的僵化框架下不能准确把握实践过程,人们可以从实践的三个层次:重复性层次、创新性层次和在这两极之间的模仿性层次把握实践概念,这要求一种过程的、形式的、异化的社会分析。总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以及人类实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机制获得批判的力量,它不排斥由实践本身激活和证实的理论,但总是指向可能性的领域,对结构和形式进行彻底的批判。一言以蔽之,这一社会学“在一无所有和整个现实之间开拓了一个居住之所”。^⑥

总之,列斐伏尔试图表明,不论从理论还是现实上来说,认为马克思思想丧失解释力与活力的看法未免杞人忧天,这一思想中蕴含的“总体性”特点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供了独特优势,其所具备的“实践性”特点则在方法论上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供了与众不同的解释问题、分析问题的独特路径。因此,我们不仅应该看到“马克思思想中的一种社会学”,还要注意到这是一种对于现代社会有效的、独创性的社会学。当然,这种有效性和独创性能否实现也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和使用马克思思想。列斐伏尔提醒我们,马克思的思想不是自我封闭的,它同时对知识和发现、对实践和政治活动,对理论的进步和深化保持开放^⑦,任何教条主义和随意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应该被避免。^⑧

① [法] 列斐伏尔 《马克思的社会学》,谢永康、毛林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② [法]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新版序言》(1986),刘怀玉译,见张一兵主编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一辑),北京:中央编译局,2006年,第176页。

③④⑤⑥⑦ [法] 列斐伏尔 《马克思的社会学》,谢永康、毛林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16、23、26-41、42、序言第3页。

⑧ [法] 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62页。

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学

与那些站在“主流社会学”立场而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敬而远之”的学者不谋而合，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并不认可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性，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社会学。众所周知，布哈林在192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概念，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①，尽管这一观点同列宁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对列宁观点的进一步发挥^②，但仍然遭到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批评。卢卡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有自己目标的独立的科学，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则不需要这种独立的实质性目标，它的领域是整个历史进程，把握历史的真相要通过理性的洞察而并非社会学的经验调查。^③葛兰西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世界观，应该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把握，而社会学是一种“实际观察的经验汇编”，将两者混为一谈颇为不智。^④更重要的是，苏联于1938年取消了注重经验研究的社会学，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里面有社会学的位置，受此影响，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主张将社会学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他们认为用社会学的方式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方面是放弃政治经济学甚至是放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严重倒退。^⑤

很大程度上，列斐伏尔是上述观点的受害者。他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试图阐释“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它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中，在它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中，会是什么（作为方法和对象）”^⑥。他将答案聚焦到异化问题上，并且从对日常生活的阐释和分析中去揭示异化的问题。然而，这种带有浓厚社会学色彩和对日常生活异化高度彰显的研究与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遭到了后者的攻击。列斐伏尔形象地描绘了这些攻击者“他皱着眉头、板着面孔、盛气凌人、虚张声势，他嗅到了某种他不赞成的东西，某种不相容的东西，某种不可能的东西；一个人不可能既是笛卡尔主义者，又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内容上和目标上，完全不同于笛卡尔主义。”^⑦列斐伏尔对这些人的攻击极为不忿，认为恰恰是这些攻击者才是狭隘无知的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是用教条化、纲领化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这样一种理解方式让马克思主义遭遇了严重的思想和方法上的贫困化危机，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与客观现实分离的险境，这种危机和险境要通过社会学才能克服。

社会学的重要性是由社会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决定的。列斐伏尔指出，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的核心，作为经济基础（如生产力、分工）和上层建筑（如制度、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而起作用。尽管社会关系并不是以一种实体化的形式存在的，但是它为个人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的重构提供了可能，被证明是各个时代最持久的东西。^⑧正是在社会关系之中，主体（处于群体、阶级和社会整体的实际关系中的个人）一方面得以在生产产品中去实现自身，另一方面也会在工作中迷失方向，异化的命题也随即被提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关系，重视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更好地把握关于宗教、哲学和政治国家等议题。遗憾的是，那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指接受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对社会关系的研究是一种科学，不愿意承认“研究社会关系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的社会学^⑨是一种科学，不愿意承认在社会中异化作

① [苏] 布哈林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页。

② 刘少杰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与理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78-99页。

③ Lukacs, G. (1966). Tech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New Left Review*, pp. 27-34.

④ [英] 博特莫尔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卢汉龙等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30页。

⑤⑥⑦⑧ [法] 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9、2、51、53页。

⑨ [法] 列斐伏尔 《马克思的社会学》，谢永康、毛林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为一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表述中,“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也被“经济基础-政治的上层建筑”这样简化的、不能反映社会关系作用的模式所替代。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让理论与现实的分离、意识形态和客观真理之间的分离越来越大,让马克思主义更加枯竭,沦为某种极端简化的“公式”。到这里,列斐伏尔对于如何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答案已经非常明显:我们只有承认社会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开展面向现实、面向社会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才能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困境和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在谈论社会学时使用了“具体的社会学”这一概念。^①这样一个“具体的社会学”显然是要与哈布林所谈的“普遍的社会学”(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分开来。实际上,列斐伏尔并不太认可布哈林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见解,将其看作为“诸多令人不满意的解释中的一种”。^②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表达的是支配所有社会的普遍性规律,如果将这种普遍规律看作为社会学,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将其看作为社会学的内容,如此,社会学就被哲学化了,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独断的东西,这是向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层次的倒退;二是将其看作为社会学的概念工具,那么我们只能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的一个导引,而不能说它是社会学本身。列斐伏尔的意思是,尽管历史唯物主义确实提供了某种普遍性的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它们之于社会学研究也很有助益,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研究的是具体的社会学,要去处理内容、事实和材料,而不能陷入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科学的自命不凡的空谈。在这个意义上,与“普遍的社会学”相比,“具体的社会学”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对具体的、生动的社会现象加以揭示和讨论,使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抽象的哲学批判成为面向现实的批判。

对于如何发展具体的社会学,列斐伏尔将眼光投向了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社会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系统,它是一些“鸡零狗碎”,但同时也是一切活动的汇聚之处,是它们的纽带,它们的共同基础,换言之,日常生活就是一个未分化的人类实践总体性。^③列斐伏尔引用列宁的话来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辩护:“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把它作为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两种分析:演绎的和归纳的。”^④这就是说,任何一种日常琐碎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们是小小的、个别的、偶然的事件(如一个妇女买了一磅糖这件偶然事件);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无限复杂的社会事件,比他本身所包含的“本质”要丰富得多(例如妇女买糖这件小事涉及这位妇女的生活、经历、工作、家庭、阶层、饮食习惯等,最终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和它的历史)。因此,具体的社会学必须高度关注日常生活,将他们看作是社会整体和部分的体现。那么,如何研究和批判日常生活?列斐伏尔提示我们应该从四个方面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第一,利用多种研究手段努力重构许多人的真实生活,并把他们的真实生活与观念意识进行比较,与他们对真实生活的解释做比较;第二,这个调查不应该局限于一定数量的以整体方式体现出来的个人生活上,而应该尽可能详尽地考察日常生活细节;第三,这种调查应该扩展到整个社会或国家层面(对列斐伏尔而言就是对法国全国开展生活方式的调查),并与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进行对比;第四,这种调查还应该关注创造生活的艺术,观察人们如何在对抗异化的生活中寻求某种可能性。^⑤

① 例如他在《日常生活批判》开篇就提到这部著作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忽略的一个方面,即具体的社会学。

② [法]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谢永康、毛林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③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1页。

④ [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2页,列斐伏尔引用的列宁原文参阅: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57页。

⑤ [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80-184页。

姑且不论关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是否完全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框架内^①，列斐伏尔构建这样一种“具体社会学”的理论抱负和内在逻辑是清晰的：即推动马克思主义走出教条主义的、不接地气的空洞论述，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重新激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应有之意。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自己的核心领域

有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质疑是指向这门学科的区域性和独立性。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一种分支社会学能够成立，它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特领域，在对某些经验现象的观察或研究上有比较深刻、独到的见解，而不是只有一些总体性的原则，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似乎并非如此。博特莫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大劣势就是它没有展开对特定现象的经验研究，在推动一些新兴领域出现上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想（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交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深刻地改变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但它自身也不断重构最终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完全消失；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已经没有了作为独立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只有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学。^② 不论博特莫尔的看法有多少偏颇之处，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在理论和经验研究层面上，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应该与其他社会学关切点有何差异，其领域的“护城河”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持续发展这些“护城河”的作用。这一问题自然也成为列斐伏尔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列斐伏尔在考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领域问题时是从马克思著作本身出发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马克思著作的段落中不做任何预设地去识别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和研究领域^③，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蕴含的发展潜力。基于这样一种做法，列斐伏尔发现了马克思思想特别在社会学三个领域具有特别的创造力和潜力，即：意识形态与知识社会学、社会阶级研究、国家与政治社会学。事实证明，这三个领域也确实是在后来沿着马克思思想路径发展的社会学创新性成果最多、影响范围最大的领域。列斐伏尔分别将这三个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应该做的主要工作和行动策略做了系统梳理。

在意识形态与知识社会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工作是打破意识形态与“真理”的虚幻联系，通过对意识形态起源的细致把握和分析，将其与社会历史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列斐伏尔敏锐地指出，马克思在两个不同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一是将意识形态看作是对现实的一种颠倒的、缩减了的、歪曲的反映，是对历史的错误表象或抽象，这是在一个否定意义上的使用；二是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拥有真正的历史和社会基础独特意识，这种基础一方面存在于分工之中，另一方面存在于语言之中。^④ 这两方面看似对立，其实并不矛盾，因为意识形态的出发点是现实，但只是片面的、部分的现实，它确实是对现实的某种扭曲性呈现，但扭曲意识形态表象的，并不是某种神秘的命运，而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其实都在现实（实践）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并不必然都是错的，这需要我们对意识形态开展具体的、实践性的分析。分析意识形态的方法，不是追溯各种道德意志和深层精神，而恰恰要回到表象的起源上，意识形态是一种“神秘化表象”，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仅要各式各样的宗教、哲学开展一种祛魅的分析，还要面向今天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意识形态/价值观框架，将知识理解为意识形态，追溯其起源、分

^① 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存在不少争论，但并非本文的主题，故不展开讨论。值得强调的是，至少列斐伏尔本人是坚信自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轨迹不断发展自己的研究的。

^② [英] 博特莫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卢汉龙等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4页。

^{③④} [法] 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谢永康、毛林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49-50页。

析其生成机制,批判性地揭示其内在逻辑。

在社会阶级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可以而且应该将工人阶级所做的努力作为研究对象。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实践超越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对人的异化的努力纳入研究范畴。^①列斐伏尔重点讨论了这一工作涉及的三个方面^②:一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层次上,要从分工出发对生产关系进行研究,揭示存在于每一个阶级社会中的复杂的、变动着的阶级结构。这里的“分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分工,一个是社会分工。按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分工对应着不同的功能,这些是被预先设定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要揭示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我们对分工的研究必须面向整个社会,不能纠缠于部门、功能或被认为是静止的层面所做的分类。在这种分析中,要警惕用“技术分工”取代“社会分工”的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唯技术论”,而且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技术永远不能取代社会关系,也不能解决社会关系中的冲突。二是在财产和法律关系的层次上,要以法典化的司法关系为抓手考察社会的不平等性。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强调《民法典》在破译资产阶级社会的隐秘意义上的重要性,将其看作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独有特征和异化状态的重要工具。实际上,司法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表达形式,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因此要对司法体制的形式化过程、对种种社会范畴的权利生成过程做一种批判与分析。三是意识形态的层次上,即用一种辩证的方式解释意识形态的阶级意义。具体而言,就是在过去和现在的多重层面上,研究他们出现的条件、他们的影响发生点、他们的重生和复活、他们的真实表象和创造幻想的功能、他们之中的转换、对他们的恶意利用等等。总之,阶级的各个部分,实际上构成了特定的社会结构,它们又在历史环境中发生着变化,因此,在对阶级进行结构性分析时必须为事件的前景和不断改变的环境留有余地。

在国家理论研究领域,马克思的社会学对国家或政治的分析至少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方面是对国家及其官僚体制的政治批判。在这一问题上,任何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国家的批判性分析,都必须以特别地研究每一种已知的生产方式、每一种历史时期和每一个国家为基础,从结构(也就是阶级)的方面,也从危机(实际上是从治理)的方面来揭示政府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国家分析并不关注国家本身,而是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将自身置于社会之上的社会领域。在实践中,国家既努力取得合理且富有成效的成果(如经济的增长),这于社会有利;又常常用政治实践来取代社会实践,形成对社会机体的侵害,总之,马克思呼吁一种对国家的基础——官僚体制的彻底批判,但这种批判也是建立在认可国家的特殊合理性基础上的。另一方面是开展有力度的政治行动(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呼唤一种关于运动的理论,这种理论包括“纲领”和“战略”两种形式。马克思没有完全拒绝纲领,但他认为“战略”具有优先性,对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战略分析,构成了所谓“具体的政治社会学”。进一步的,马克思区分了三种“战略”:一是运动集合了大多数人民而不诉诸暴力(英国模式);二是运动集合了大多数人民而诉诸暴力(德国模式);三是运动只能集合少数人民而诉诸暴力(法国模式),这三种模式可以看作是把握社会运动的一种理想类型。

可以发现,列斐伏尔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在上述三个领域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和未来发展的行动策略,但于列斐伏尔而言,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是开放的,他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只能涉及这三个领域,在这三个领域的诸多现实、环境和问题的解释也绝不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学,更重要的是发展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亦步亦趋显然是不可取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列斐伏尔关于日常生活的批判中,关于都市空间的研究中都能够看到他不断重回

^{①②} [法] 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谢永康、毛林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9、80-92页。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经典议题——知识与技术、阶级与抗争、政治与国家——并建构了带有自己独特个性社会学发展路径。

四、总结与讨论：迈向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列斐伏尔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辩护”并不限于在《马克思的社会学》和《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两部著作中，只是这两部著作集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相关原理而已。在列斐伏尔漫长的一生中，他始终秉持一种既充分开放又坚守底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通过持续地学术创新和理论探索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新领域、新方法，获得了世界性荣誉，无怪乎戈特迪纳（Gottdiener, 1993）给予他“也许是马克思以来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很少的、真正了解马克思的思想的社会分析家之一”这样极高的评价^①。通过梳理列斐伏尔如何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辩护，我们得以澄清一些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误解和质疑，这一工作不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非常重要，对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也极为迫切。尽管在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有大量学者探究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但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陷入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大抵与国外情况类似，正如刘少杰（2008）所言，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有历史唯物主义而没有社会学，而一些社会学学者则从实证主义社会学立场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划在社会学范畴之外。^②近年来，不少学者重新致力于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本质特点、学术地位、历史发展和广泛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③，但对于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逻辑下理解社会学、如何厘清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键概念、如何夯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领域“护城河”等问题讨论还有限，而列斐伏尔的相关论述在上述方面能够对我们有所启示。

首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思想总体性下的社会学，不是寻章摘句建构的社会学。正如戈特迪纳所言，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意味着我们首先有必要知道马克思是如何思考和分析社会，而不是他说了什么，^④列斐伏尔无疑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者来说，关键是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着眼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形成对中国社会总体性的宏观把握；第二，如何立足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反思“主流”社会学之于社会问题的一般性分析和判断。对于第一个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论述，这一论述反映了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社会总体性的深刻把握，但如何进一步理解这一转化的重大意义与深刻内涵，回应“社会转型”（既往社会学关于我国社会总体状况的经典概括）与“主要矛盾转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仍然需要深入探讨。对于第二个问题，对“主流”社会学的前提性假设进行讨论虽然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倡议^⑤，但实践者仍然不多，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论者更是寥寥，这是一个需要持续推进的重大议题。

其次，对实践、需求、异化、生产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键概念进一步厘清。马克思关于社会学的若干核心概念今天处于一种“两极分化”的状态：一些概念颇为时兴，例如生产、实践、异化等；另一些概念则使用频率很低，如需求的概念。有意思的是，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学概念大多经过西

^{①④} Gottdiener, M. (1993). A Marx for our time: Henri Lefebv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Sociological Theory*, 11 (1), 129-129.

^② 刘少杰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与机遇》，《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5第124-131页。

^③ 刘少杰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与理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78-99页。

^⑤ 如刘少杰教授早在2000年就提出反思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问题，潘绥铭教授也于2008年提出对“元假设”进行反思的问题。

方社会科学理论家反复使用而变得面目全非,即使那些时兴的概念也鲜有在马克思思想的原意上去使用的。列斐伏尔曾就“生产”概念的过度使用做过批判,指出右派将生产看作与粗糙而野蛮的经济主义不可分割的东西,而左翼甚至将概念、话语、梦想、文字这类东西都置于生产的话语中,生产甚至可以没有劳动者、没有生产过程、没有产品。^① 尽管概念的泛化本就是学术发展的一个常见现象,但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视野内探讨社会学问题仍然涉及一个概念内涵明确的问题,否则可能流于鸡同鸭讲。此外,一些使用率不高的概念绝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列斐伏尔将“需求”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分析的起点,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日益多样化,社会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不断增加,亟需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角度展开深入探讨。

最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护城河”是在更加切实的经验研究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终能不能在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占据关键位置,关键问题还是这种社会学能不能有效地指导经验研究,形成具有理论解释力和政策实践指导力的重要成果。列斐伏尔通过不断推进自己的日常生活社会学和空间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护城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目前还主要在理论梳理层面,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经验性社会学研究虽然也有一些,但一方面总体数量不多,另一方面人们更习惯在西方理论家发展改造了的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微观或中观理论指导下直接展开经验研究,因此近年来关于劳动过程、空间生产等相关研究颇多,但在直接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与分析路径开展的社会学经验研究较少,未来也是需要着重发展的。

总之,正如列斐伏尔强调的一样,马克思思想作为我们当今社会重要的、原创性的、富有成效的、不可取代的要素^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可以也应该激发出更多、更大的活力,这有赖于我们不断探索与扎实推进。

基金项目: 2019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研究”(2019MZD023)。

作者简介: 营立成,男,北京市委党校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区治理。

^①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Ltd, p72.

^② [法] 列斐伏尔 《马克思的社会学》, 谢永康、毛林林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147页。

理论超越与方法创新

——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启示

陈 甬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马克思的思想早已超越了单一学科的限制,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社会学的传统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与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并立的三大传统之一,在各个研究领域产生持续且深远的影响。而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仅作为一种理论来解释世界,更是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近200年历程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东欧社会主义实践以及对整个现代社会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回顾和研究,对于今日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学

二战后,东欧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往往同时受到马克思本人思想、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欧美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多重影响,其研究和理论构成异常丰富,对主流马克思主义的扩展和创新也逐渐出现,国内学界也将其划分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派^①。这些学者包括南斯拉夫实践学派的马尔科维奇,波兰的科拉科夫斯基、沙夫,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匈牙利的卢卡奇、瓦伊达、马尔库什、费赫尔、赫勒等等。这些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和学说不尽相同,甚至在政治立场上也存在分歧,但大都是在面向东欧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客观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同时融合了西方尤其是欧洲近现代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另一个共同之处在于,这些学者都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大部分学者的理论观点超越了单纯的意识形态障碍,在东西方学术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除却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仅仅针对哲学文本和哲学史进行研究的学者,我们将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研究称为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在国内以往的学科划分中,以上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说被界定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尚未完全进入到社会学界的视野之中。在传统主流社会学的观念下,尤其是在以量化研究为主流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视域下,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一概念无疑是存在着争议的。这种争议首先来自方法论意义上的学科限定。在实证主义的要求下,当下主流的社会学研究追求一套严格限定的研究流程和方法,追求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以此衡量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无法满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规范要求,或者不屑于满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要求,甚至建立在批判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在研究视野上,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并不局限于主流西方社会学的偏微观领域,而是采用一种偏向宏观的理论视角,综合解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美学和道德等诸多问题。

然而,如果我们跳出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学科边界,以更加包容的视角重新审视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从研究的对象上,还是从学科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角度看,东欧马克思主义

^① 衣俊卿:《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求是学刊》2010年第1期,第5页。

义关于社会的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学。

从研究对象上看,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大量研究清晰而明确地指向现实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研究和当下主流社会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共享了相同的研究对象,即同样面对现代社会中的种种经验性社会现象。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经验属性,是社会学古典时期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对社会学这一学科确立的重要学科承诺之一,也是将社会学与纯粹观念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哲学研究进行区分的标志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是一种社会学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研究,毫无疑问应当是一种真正的社会学研究。

从社会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角度来看,绝大部分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和理论并没有放弃客观性的承诺,只是对于如何达到研究的客观性、如何界定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主流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实际上源自马克思主义对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追求,与实证主义的追求并不完全等同。在主流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看来,研究者应当实行一种价值中立的原则,以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看来,研究最终虽同样达到一种科学性和客观性,但这种客观性和科学性与实证主义的内涵不同。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是需要加以批判的,必须要承认历史诠释者在诠释历史时,不可避免地带入了自身的主观性。但是这种主观性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的解释一定是无法实现客观的。社会科学家本身的主观性就受到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脱离客观的历史和社会而存在的^①。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家的阐释和思辨又是客观的,至少是可以分析出这些主观阐释背后的客观制约条件的。

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源泉除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中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理论观点之外,还源自对早期马克思作品的重新挖掘,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对当时东欧社会研究影响十分深远。早期卢卡奇对马克思的物化、对象化、实践等问题的论述构成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起点^②。除此之外,绝大部分东欧学者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哲学训练,深受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维特根斯坦、波普尔等不同理论流派的启发和影响,也借鉴了当时欧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前沿研究和观点。20世纪80年代之后,东欧富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大都离开本土,其后的研究虽然依然打上马克思的烙印,但是其理论和现实关注点逐渐与当代西方学者更加趋同,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和立场也发生了转变。

在总体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这些不同国家和学派的学者基本上都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哲学理念,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地位,共同使用一种批判的研究方式,对当时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整个人类的现代社会诸领域进行相对宏观层面的批判和反思。如果用一个共同的学术主题来概括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话,那么批判现代性显然可以成为这些学者社会研究的最重要议题。在批判现代性的大前提下,东欧学者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社会问题和现象、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和现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文化艺术和美学理论、社会革命问题、道德问题、权力问题等多个具体的领域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社会学基本理论矛盾的回应与超越

在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理论阵营中,长期存在着结构与行动、制约性与自主性、宏观与微

^① [波兰] 亚当·沙夫 《历史与真理》,张笑夷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3-126页。

^② [匈牙利]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8-22页。

观、客观与主观、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论对立。这一基本的对立构成了社会学理论流派划分的重要标志,也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和研究取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诸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结构主义等等都在试图从元理论层面弥合这种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对立。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而言,如何处理社会学理论阵营内部的这一基本矛盾,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论取向的选择问题。

马克思本人的社会研究往往被视为偏向结构主义和决定论,也被认为比实证主义提倡的科学性具有更强的亲和性。而与马克思有着极大关联的法兰克福学派,又被认为是诠释学派的重要代表。然而,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方案是将马克思的辩证法引入到社会研究之中,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重新回答社会问题,并且超越了社会科学内部的理论对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对于传统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和创新。

在实证主义的阵营看来,社会结构在逻辑上优先于社会行动,社会学基本的研究对象诸如社会事实、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等结构性的因素,应当用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社会学研究最核心的问题是探寻社会事实之间,也就是变量之间的客观关系。在研究中可以排除先入之见,实行价值中立原则,达成一种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研究。而人文主义则坚持行动优于结构,强调对个体社会行动的诠释和理解,通过一种历史主义的诠释学方法,来完成对社会现象的理解。

在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阵营中,沙夫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层面,指出了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结构和行动、主观和客观等方面对立的根源。沙夫提出,知识正是在认知主体认识认知客体的关系中产生的一种过程。在沙夫看来,社会科学的知识实际上蕴含着以往众多哲学家的不同哲学思潮,他将不同哲学观念对认识过程的想法划分为三种基本模式:根植于机械解释的反映论、唯心主义的能动主义和能动解释的反映论。实证主义对应着第一种模式,其根源就是马克思曾经批判的机械的唯物主义,认为“主体在认识关系中是一个被动的、直观感受的要素,其充当一个记录外部刺激的工具,极端地来看,主体充当镜子的角色”^①。社会科学中的诠释学传统对应第二种模式,是一种认识主体占据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它片面地强调认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被动直观的模式中,是客体在主体-客体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第二种模式正相反,是认识主体处于优势地位……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为唯心主义的能动主义”^②。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研究方法论,则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沙夫将它命名为“能动解释的反映论”,就是在强调客体既可以相对真实地被主体所认知,又在认知的过程中发挥了能动作用。在第三种认识模式中,“反对认识关系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占优势的原则——要么是客体占优势(第一种模式),要么是主体占优势(第二种模式)——它强调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③。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它看上去似乎是对认识关系中主观第一位还是客观第一位的简单折衷,但是实际上是对主-客二元对立关系的一种超越。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主体和客体、行动和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西方的主流社会学界,甚至包括中国社会学界在内,尽管在社会学中主观与客观之间、能动性与制约性之间、诠释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对立,但是很少有社会学学者借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来回应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割裂状态。西方社会学界中,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的论述、布迪厄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观点甚至包括格兰诺维特关于社会学中过度社会化和社会化不足的论述,实际上都是在试图寻找某种方法来调和社会学理论内部长期存在的基本矛盾。但是,主流的社会学界实际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意义,马克思本人也不会预料,更不必说回应日

①②③ [波兰] 亚当·沙夫 《历史与真理》,张笑夷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58、60页。

后西方社会科学存在的这种认识论分裂和方法论分裂的困境,沙夫在对历史研究何以可能的问题探索上,实际上相当敏锐地意识到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解决和回应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割裂问题上的重要意义。

将辩证法的思维引入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同样是马尔科维奇和科西克进行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基础^①。马尔科维奇总结了批判的辩证方法的结构,提出了辩证批判要遵循五大原则。这五大原则构成了使用辩证法进行社会研究和社会批判的基本方法框架,分别是总体性原则、历史性原则、自决原则、矛盾原则和超越原则。尤其是在讨论历史性原则和自决原则时,马尔科维奇认为自决原则一方面是对机械决定论的批判,但同时又是对非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批判。机械的决定论例如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过于绝对地认为某一种或者几种因素决定了历史的走向。但是从另一方面,辩证法已经告诉我们,人的自由并非无限,未来也不是在每一种逻辑可能的方向上都不断超越自身。人及其境况仍然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人仍然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性^②。所以,人们仍然可以讨论历史的决定性。只是这种决定性必须排除其他的逻辑上的可能性,才能是一种决定性。

如果我们比较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社会学基本理论矛盾的回答和迪尔凯姆、韦伯、吉登斯、布迪厄、格兰诺维特、科尔曼等学者解决方案的异同,我们会发现,将马克思的辩证法引入社会科学后,之所以构成了对传统社会学理论阵营的超越,其重要原因在于以往社会学家往往对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和个体行动的自主性的矛盾,或者选择其中的一端(如迪尔凯姆和韦伯),或者在理论上试图将二者(行动与结构、主观与客观)统一(如吉登斯提出制度的二重性、布迪厄的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③④⑤}),但是较少提出制约性和自主性之间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此外,以往社会学的理论探讨,往往是抽象地探讨决定性和自决性导致的方法论冲突,评价其得失的标准也是从具体研究的有效性和正当性角度。而在马尔科维奇、科西克、赫勒等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社会研究本身即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实践问题。社会研究者自身、研究对象和历史真理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最终需要通过实践来完成和检验。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而言,从辩证思维来看,偏执于实证主义,或者偏执于历史主义都是无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应当是对以往主客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总体性的超越。其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客观地解释这个世界,获得某种解释的正当性和科学性,而是为了更好地改变人类社会。因此,在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时,理论和方法论的争论应当以马克思的辩证法为依据,遵循实践的需求,在有必要的时候应当悬置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的争议,或者采用辩证思维超越二者的对立。这种元理论层面的议题,也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三、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体研究方法的启示

在研究路径上,与实证主义纯粹的因果解释或者机制解释相比,绝大部分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判理论传统,采用批判理论的形式,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理论的研究路径和主流社会学的因果解释与机制解释的路径和取向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实证主义社会学看

^① [捷克斯洛伐克]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刘玉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② [南斯拉夫]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43页。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页。

^④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37-41页。

^⑤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来, 获得客观的因果性是需要摒弃一切先入之见的。但是批判理论的要求实际上并不是抛弃解释, 而是在解释和揭示事物内外矛盾的基础上, 对事物的历史发展趋势做出判断, 并且介入到现实社会的实践之中, 通过批判不合理的制度和现象, 来实现正当的社会与人的发展。

这样一种批判研究和介入社会实践的取向, 就必然要求价值观的介入, 并且是在研究尚未开始前就明确和假定一种合理的、正当的应然状态, 来作为揭示不合理的研究对象的潜在标准。

因此, 在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中, 价值观的介入是研究的一项基本前提。在马克思本人的研究中, 实际上就隐含着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对被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同情和关怀。在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中, 马尔科维奇提出了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 科拉科夫斯基、赫勒、费赫尔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极权主义的价值观, 这些都是蕴含在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的价值观念。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价值介入, 并不意味着客观性的丧失。与西方主流的价值中立研究相比,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由于价值观的介入, 似乎是失之理性, 或者缺乏某种客观性。但是, 在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 所谓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研究, 对客观性实际上是求而不能。很多研究事实上依然成了党派利益、政治利益、资本利益下的价值介入研究, 区分就在于这些实证研究以“价值中立”为外衣, 对所谓的科学研究进行了华丽的包装, 完全摒弃主观性和价值观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 几乎是不能实现的幼稚的理想。

就坚持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和实践取向批判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介入情况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西方主流的自然科学化的社会学并没有本质差异。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承认自身研究的局限性和价值介入的客观事实, 承认社会研究中的绝对客观性难以实现。唯有认识到社会研究的客观性是一种有限度的客观性, 才能更加真实地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 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意义上的真正客观性和真理性。在这个意义上, 东欧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研究也同样承担起了自马克思开始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理论承诺。

在社会研究更加具体的方法层面, 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加重视历史的视角和思辨的方法。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依然是面向经验事实的研究, 这意味着必须以“真实”的经验材料作为基础, 并且这种材料是具有历史性的, 不应局限于当下的材料。但是同时, 辩证法的引入意味着理论思辨能力和理论批判能力在社会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经验材料的占有和描述并不能取代对历史经验材料的理论洞察和穿透。

科西克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研究为例, 提出辩证法研究的方法包括三个阶段: 充分地占有材料, 把它掌握到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详尽水平; 分析它的不同发展形势; 探寻它们的内在联系, 即确定不同形式在材料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是一个历史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按照辩证运动的规律, 对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进行阐释, 厘清其中错综复杂、变化莫测的关系。科西克认为, 通过叙述和阐释的方法, 最终实现的目的, 也是辩证法的最终目的, 不是对社会-人类现实进行的一种简单还原, 而是精神地、理智地再生产社会的一种方法。^①

针对如何更好地达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 赫勒提出了核心知识和外围知识的划分, 划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边界问题。在核心知识上, 赫勒强调应当严格按照社会科学的规范, 获得相对确定性的知识。这部分知识, 也就是符合可重复性的要求的知识, 任何的社会科学家来进行研究, 对核心知识的获取都不应当产生重大的偏差, 核心知识是可以证伪的。外围知识则是建立在核

^① [捷克斯洛伐克] 卡莱尔·科西克 《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 刘玉贤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22-30页。

心知识的基础上,外围知识是难以达成共识的,因为人们的理论、洞察、诠释和理解都会有所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围知识没有意义,外围知识反而“能够给核心注入原创性、创新、新奇、惊异的要素……注入一种意想不到的、想象的要素”。^①赫勒认为二者应当处在一种良好的平衡之中,即通过实践智慧来解决二者之间的平衡的问题,也即是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虽然并非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但是仍然是与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实践中的智慧指引着社会科学学者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太多或者太少”的标准。^②

由此可以看出,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际上在价值介入、研究客观性、研究的思辨性上试图追求一种辩证的统一。研究中价值的介入,似乎违背了客观性的原则,但是却更加接近人类认识的本来面目,诚恳地承认了研究者在客观上价值中立的限度,反而更加逼近研究的真实。在研究的客观性上,无论是科西克,还是赫勒,都强调要尽可能地搜集足够的经验材料和历史材料。赫勒更是借鉴了实证主义研究的优势,区分了研究的核心知识和外围知识,认为至少有一些知识和信息,是在社会研究中相对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获得的。而在外围知识上,在理论洞察力的层面上,是需要进行思辨的,这也是辩证思维和社会学的想象力发挥作用的地方,这种客观知识和理论思辨诠释的平衡,是以往的西方社会学研究主张中较为罕见的。如果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能够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反而可以比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主义更加逼近社会现实,同时又能够避免实证主义研究的肤浅化和常识化。

四、超越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局限:从社会批判理论到社会建设理论

尽管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学术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相对于传统的西方社会学研究,具有较强的创新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完美的。恰恰相反,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直存在于理论和实践的困境之中。^③破解这一困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超越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延续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看作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未成熟样态,把针对东欧自身社会主义社会的批判研究看作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成熟标志,那么从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脱离苏联模式,走向真正独立和成熟之日时,其自身就蕴含着难以避免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多重困境。

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诞生之时,就同时面临着两大竞争对象。首先是苏联专家拟定的,作为苏联和东欧官方意识形态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次是来自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流派。对于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者而言,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非本土化的、外来的苏联思想,其背后是当时冷战背景下一套完整的苏联式政治经济体制。东欧马克思主义者最富于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及东欧各国的本土实践中,寻找到突破,试图以正本溯源的态度,重建马克思主义思想,以适应东欧社会主义本土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尝试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当时所谓苏联式社会主义正统理论的攻击和诘难。当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无法摆脱苏联的影响时,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独立地位实际上也难以维系,这种矛盾直接危及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这就导致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各国官方政治力量之间的疏离化。这也是大部分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者被迫出走的重要原

^{①②} [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现代性能够幸存吗》,王秀敏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13页。

^③ [匈牙利]米哈伊·瓦伊达《国家与社会主义——政治论文集》,杜红艳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因之一。

从理论困境上看,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坚持一种批判社会现实的研究取向和路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但是困难在于,在马克思主义诞生时,所批判的对象是非常明确的,即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批判是围绕资本、生产与再生产、阶级斗争、劳动异化、剥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问题展开。当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批判对象在本土社会不复存在,如何将这些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移植或者发展到对本土社会的批判之中?对此,从卢卡奇开始,东欧理论家实际上回到马克思,重新从马克思的文本,尤其是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寻理论资源,用以批判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社会。

然而,在批判之后应该怎么办?这是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力所不及之处。尽管从理论上而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批判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重建社会,但是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没有给出更加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和行动纲领。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学派的理论家,一度以重建人道主义作为解决社会经济危机的方案,但是限于种种历史因素,并未能真正发挥实践的效果。更多的学者则是批判大于建设,未能有效地提出解决东欧社会危机甚至是某一具体社会问题的可行方案。这一现象的根源恐怕不在于学者的自我意识,而来自于当时东欧社会的现实困境。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大的困境,不在于理论内部逻辑的自治性,而在于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紧张关系。

对于今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而言,相较于东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作为一个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正走在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上,具有一种发展道路和发展理论的双重自主性。同时,中国的发展实践尽管有着曲折和问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伟大的实践才能造就出伟大的理论。在这一良好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应从一门以批判为主的学科,转变为一门更加具有社会建设意义的学科。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经世致用的入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取向是高度契合的。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失去了批判的传统,恰恰相反,社会建设一定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问题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是社会批判的下一环节,是对社会批判理论的进一步超越和提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不再需要刻意去解决诸如社会主义理论和东欧社会危机之间的矛盾问题,也不用以价值中立为名远离社会实践,而是应当更加积极地主动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之中,通过社会研究去积极地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演进的历史进程之中,实现一种学术、政治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大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19XNLG04)。

作者简介:陈甬,男,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互联网社会学、理论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县域研究探索

——《寻乌调查》新启示

吴时辉

1930年,为应对党内对革命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及路线分歧,深入探索红军城乡工作协调的路径,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毛泽东开展了寻乌调查,这是毛泽东一生时间最为集中、对象最为底层、座谈最为深入、内容最为丰富、材料最为翔实、文字最为生动的调查^①。《寻乌调查》全面梳理了寻乌人口与阶层状况、经济发展现状与困境,并探寻摆脱困境的对策良方,推动红军重新激活城乡社会,为当时的革命道路选择及战略决策提供了正确依据。适逢“寻乌调查”开展90周年,再读《寻乌调查》,有助于深入领会毛泽东调查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意义,深入发掘《寻乌调查》对于革命时期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价值,深入思考《寻乌调查》对当下县域研究及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的有益启示。

一、《寻乌调查》的缘起、历程与主要内容

1927年7月国民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重新思考革命道路和战略决策,放弃去上海“住高楼大厦”,选择扎根农村“交绿林朋友”。1930年5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攻占寻乌县城。5月中旬,红军在安远、寻乌、平远等地开展发动群众工作。值此良机,毛泽东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邀请包括商人、贫农、中农、曾经的小地主、秀才等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群众多次召开调查会议,历时十余天。还精心设计调查纲目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实地调查,深入研究寻乌县城及郊区情况,深入了解各行各业民众的生活及思想境况。1931年2月,毛泽东将30余天的调查数据与资料整理形成了8万字的《寻乌调查》^②,共5章39节,对寻乌的政治区划、地理交通、商业活动、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分析,是毛泽东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是其农村调查的经典之作。《寻乌调查》是全面反映土地革命时期寻乌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

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的初衷,一是革命斗争的需要,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超越农村的革命空间限制,需要充分了解城乡差异及其关联,需要在县域视野下开展社会调查,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寻找正确思路与对策。二是回答“城市中的各阶级是怎样作业的”“城市中市场的经济形势如何”等问题,厘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处理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革命统一战线,从而扩大和强化革命阵营与力量。

《寻乌调查》内容全面而翔实,包括寻乌县城人口的政治地位及成分状况、寻乌县城的商业情况、旧有土地关系、剥削情况和现有土地斗争情况。对于人口的政治地位及成分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社会各阶级关系和革命道路的选择。对于寻乌县城商业状况的深入调查则有利于探讨提振经济的出路。对于土地关系、剥削情况和土地斗争情况的了解则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状况。立足经验事实、实事求是的调查结论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

《寻乌调查》一大特点就是详尽描述了当时的商业状况。寻乌县是当时根据地通往白区的门户,

^① 石仲泉 《中央苏区调查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第27页。

^② 文丰安 《论寻乌调查的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毛泽东研究》2018年第6期,第80页。

是根据地经济贸易中转及承接的枢纽。寻乌城有定期的圩场交易,还有大量店铺,是寻乌县域的商业中心。毛泽东全方位了解了寻乌及周边沿途的商贸往来,仔细调查当地的货物交易及各店铺规章制度等。调查内容详细而全面,调查门类和行业齐全,对货源、销量、销售对象等均作了详尽了解,对90多家店铺店主的态度、发家历史和生活境遇都做了详细调查。《寻乌调查》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理论指导,以寻乌县城为核心,包括周边郊区的“县域社会”全景式的观察和研究,对于当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式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二、《寻乌调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文本和杰出成果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得到了继承与传播,在西方社会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①在俄国形成了以列宁、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形成了以毛泽东、瞿秋白、李达等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欧洲,出现了卢卡奇、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②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早期代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从生产关系以及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去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③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深入社会实际、积极开展社会调查,根据经验事实做出理论概括和政策决策。脚踏实地地观察生活、认识社会并推进社会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大厦建立在真实的现实基础之上。毛泽东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战略决策建立在经验事实和革命实践基础之上。^④《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重要研究成果。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引领者和行动者,为掌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特点,为制定革命方针寻找科学有效依据,他在中央苏区时期先后开展了包括兴国土地法、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在永新等处对分田后的富农问题调查、吉水东塘等四个地方的村乡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调查、江西土地斗争错误问题在吉安的调查、分青和租田问题在吉安的调查、吉水木口村调查、兴国长冈乡调查、上杭才溪乡调查等十多项社会调查。这些调查广泛涉及中央苏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阶级状况、土地历史、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宗祠族权、家庭伦理、世俗习尚、风土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⑤而“寻乌调查”是毛泽东所从事社会调查中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寻乌调查》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起步的典范。^⑥

《寻乌调查》紧贴中国乡土,紧接中国地气,直接对准当时严峻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树立了崭新形象^⑦。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体现了鲜明的价值判断和强烈的变革意识,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既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的使命和担当。《寻乌调查》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使命,洋溢着批判性和革命性色彩。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调查研究既是了解社会的工具和途径,更是改造社会的方法和武器。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有效甄别了革命的依靠力量、团结对象和主要敌人,深刻影响了革命政策及策略的制定。

《寻乌调查》还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优势。毛泽东的研究志趣不仅仅是了解和掌握寻乌城基本概况,而是要管中窥豹认识整个中国。通过对寻乌这一典型个案的条分缕析,寻找复杂社会的“遗传密码”,最终把握宏大中国的发展脉络。《寻乌调查》是毛泽东“无心插柳”之作,

①②③④ 刘少杰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与理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78、95、82、92页。

⑤ 石仲泉 《中央苏区调查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第27页。

⑥⑦ 张珊珍、李凌晨 《解读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社会学研究价值》,《苏区研究》2015年第3期,第29、30页。

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研究视野、研究主体和研究方法具有独特范式,充分展现出《寻乌调查》在社会学调查研究领域的原创力^①。《寻乌调查》对西方社会学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驾轻就熟、信手拈来,是社会学实地调查的范本。《寻乌调查》作为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篇调查报告,政治意义和科学价值相得益彰,历经90年岁月洗礼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沧桑而历久弥新。

三、《寻乌调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县域研究的成功探索

县域是极富历史感和空间感的研究对象。滨岛敦俊在研究中国明清历史时,发现县域社会是一个地方有力阶层掌握主导权的生活世界。这些有力阶层包括乡绅和地主、商人和生员等。他进一步指出,这个生活世界又具体地分为三个鲜明的亚世界:小农的“社”世界、下层士人与商人的“乡脚”世界以及乡绅的“县社会”。^②从历史的维度看,县域是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基础单元和空间概念,理应获得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从社会治理视角看,县域是社会治理的基石和重要空间,“郡县治天下安”。县域产生于春秋晚期,推广于战国时期,到秦朝郡县制普遍建立,其历史长达2600年。“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民为邦之本,县乃国之基。安之难,难在固本;治国之难,难在强基”。从历史变迁视角来看,郡(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甚至省市)这一治理单位变动不居,而县一直延续至今。县和县域首先作为治理单位而受到重视,治理好县这个“基”,就能坐稳江山。县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石,不仅在于规模小易治理,更在于县是自成一体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共同体。^③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来看,县域是了解中国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和重要抓手。遗憾的是,社会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历程中,县域这一概念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城乡发展的融合地带,这一重要的空间概念被淹没在单独的城市或乡村研究中。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和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是为数不多的县域研究的早期探索。当时的革命运动形势也暗合了县域的重要性,革命家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都将目光投射到了县域这一独特区域空间上。

县域既是中国行政区域的基本单位,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革命运动扎根地方的基础支点。在赣、闽、粤等南方省份,在城市难以立足的中共党员或革命人士,主动或被动潜返乡,立足县域聚集和发展势力,使中共革命呈现为由各县革命势力联合发动的一场群雄四起的地方革命运动^④。因此,县域成为革命家青睐的空间选择,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典型研究空间。《寻乌调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县域研究的成功探索,在研究单位上选择了县域这一城乡融合地带或中间节点。这是一个包含了农村和城市两个概念的立足县域层面的调查研究,有助于更好理解农村和城市的差异和衔接,有助于理解县域文化的个性与特色,有助于更好理解县域社会风险与公共服务能力。《寻乌调查》同时调查了乡村和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全面掌握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土地分配及其斗争的复杂情况,为正确制定有关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具体政策,为确立土地分配中的基本原则,提供了立足经验事实的科学依据。

^① 张珊珍、李凌晨《解读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社会学研究价值》,《苏区研究》2015年第3期,第34—35页。

^② 滨岛敦俊《农村社会——研究笔记》,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周绍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转引自王春光《县域社会学研究的学科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第37页。

^③ 王春光《县域社会学研究的学科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第37页。

^④ 黎志辉《“寻乌调查”的中共革命的微观阐释——以对毛泽东〈寻乌调查〉的史料补充为基础》,《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6期,第71页。

随着我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县域社会治理重要性的凸显, 县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目光, 从而加速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单位和研究对象, 社会学的研究单位正从社区拓展到县域。与此同时, 县域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县域作为研究对象, 现有的调查研究方法是否仍然有效? 县域社会研究是否需要独特的研究方法与之匹配? 县域社会包含着村落和城镇两种不同的空间类型, 从人口数量、空间布局、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差异性、文化多样性、经济发展水平和复杂性、治理体系系统性等方面来看, 县域社会兼具社区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县域社会研究可以容纳现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方法: 对整体社会的研究方法都适用于县域社会, 比如文献分析、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①《寻乌调查》的研究方法自觉吻合了县域社会研究的方法原则, 娴熟运用了文献分析、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社会学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契合于县域社会的复杂性、差异性和多样性。

县域不仅连接着被视为分离的城乡二元, 也是具有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社会共同体。当前我国正处在脱贫攻坚任务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积极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关键期和战略机遇期, 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需要县域社会的理论视角和政策考量。重读《寻乌调查》这一经典著作, 重温其县域研究探索的理论意义, 可为今天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带来新的启示。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县域财政能力的社会风险类型及其治理路径研究——以江西省为例”(20SH06)。

作者简介: 吴时辉, 男, 江西财经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讲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空间社会学。

(责任编辑: 徐 瑶)

^① 王春光《县域社会学研究的学科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第44页。